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重磅品荐

长安陌上花如旧

王小柔

《万里赴长安:唐代诗人的功名、诗酒与归途》,枫见月著,西苑出版社2026年9月出版。

“长安陌上花如旧,多少人间梦未休。”《万里赴长安:唐代诗人的功名、诗酒与归途》开篇第一句,就把读者领到了那条开满旧花的陌上。

长安之于唐人,是一个滚烫的名字,李白二十五岁仗剑去国,绣口一吐,就是半个盛唐;杜甫旅食京华,致君尧舜,偏偏怀才不遇,乱世却成就了他不朽的诗篇;孟郊雁塔题名,写下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……289年国祚,无数人揣着梦奔赴这座城,为的不过是安邦定国,或者举酒高歌。

五十位唐代诗人,从初唐四杰到温韦花间,都被重新拉回人间:讲他们的功名求索、诗酒逍遥、爱恨得失,也讲他们的委屈、不甘与遗憾。

功名这道窄门

最先被撞疼的,是那些走在功名窄门里的人。

张九龄是岭南走出的第一位宰相。书中写他五岁可吟诗,七岁能写文,十三岁献文于广州刺史王方庆,被断言日后必大有作为。他一生最惊心动魄的举动,是力主斩杀安禄山。那一年安禄山讨伐契丹贪功冒进,全军尽没,按律当斩,玄宗却赦免了他,命其戴罪立功。张九龄再上奏章,断言:“禄山狼子野心,面有逆相,臣请因罪戮之,冀绝后患。”玄宗竟疑他没有宰相气量,将安禄山放还。近二十年后,安禄山发动叛乱,唐朝由盛转衰,战乱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散,国家掌握的在籍户口也急剧下降。

这是历史最冷的一课。最清醒的人,往往最先出局。张九龄被李林甫构陷罢相,赴荆州途中写下《望月怀远》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千载之后,仍是中国人心里最温柔的月夜。他还有一首《感遇》: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。”那是写给所有失意者的回答,你的价值不需要谁来折取,你自己就是春天。玄宗晚年,每有人举荐人才,都要问一句:可有张九龄的风度?安史之乱后玄宗避蜀,忆起张九龄失声落泪,悔当初没听进言。可惜天下没有后悔药,大唐的国运,正是从那位贤相罢职那一日开始直线坠落的。书中这句判断下得冷,却冷得让人无话可说。

颜真卿是把功名活成骨头的人。天宝十二年(753年),他遭杨国忠排挤,外放平原太守,恰在安禄山治下。他一面加固城墙、招募壮丁,一面终日与客饮酒泛舟,让安禄山得出“一介书生耳,不足为虑”的结论。安史之乱爆发,河北二十四郡如巨浪拍舟,唯平原固若金汤。书中有一个细节,读时几乎不敢呼吸:叛军斩杀东都留守李憕等人,送来首级震慑。颜真卿怕将士失了守城之志,谎称“这些头颅不是他们的”,又命人用草编身,接上首级。下葬时,他不忍三人满脸血迹,以舌舐之,设灵位哭奠。一个朝廷命官,用舌头一点一点舔去忠烈脸上的血污——这是全书最骇人、也最动人的画面。

后来,他的从兄颜杲卿死守常山,城破被俘,骂贼不绝,被割去舌头,受剐刑折磨至死,颜家三十余口遇害。乾元元年,颜真卿寻回侄子颜季明的首级,痛哭不止,手书《祭侄文稿》。那卷被称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的墨迹,运笔由慢至快,悲愤难掩,椎心之痛尽落纸端。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,原来是一腔血泪凝成。这之后,颜真卿又活了二十多年,历事四朝,最终在七十七岁高龄,独自踏上前往叛军李希烈营中的“归途”。被囚一年有余,缢死于蔡州龙兴寺柏树下。他为自己取字“清臣”,清正之臣,这一生,他走成了大唐的一根脊梁。

诗酒这杯浊酒

如果说功名是窄门,那么诗酒,就是唐人的后门。门内刀光剑影,门外醉里乾坤。

书中写贺知章,写得很有趣。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里他列首位:“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”一个三品大员,喝醉了骑着马在长安的街上左晃右晃,一头栽进井里,在哪里跌倒,就在哪里躺平。他常泡在同一家酒馆,端坐正中央,有酒必诗,有诗必酒,写完了随手丢,围观者就等着捡他丢下的诗句,回家裱起来。他初见李白,读其诗,惊为天人,解下腰间金龟换酒,直呼“谪仙人”。后来李白入翰林,正是他与玉真公主交口称赞的结果。贺知章生在盛世,长在盛世,老在盛世,八十六岁告老还乡,写下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。五十年没回过故土,故乡已经不认识他了。可这个老人不悲,反把“被故乡当作客人”这件伤心事,写得天真烂漫。书中说,贺知章笔下的诗文没有悲苦,只有欢乐,犹如他的人生。这不是没心没肺,是真正活明白了:盛世肯给他托底,所以他敢醉,敢狂,敢把一生过得像一场长醉。

李白呢?仗剑出蜀时,他遇见同道吴指南,结伴而行。吴指南病逝于洞庭湖畔,李白亲自守丧,悲痛欲绝,路人都为之伤心;猛虎逼近时,他仍守在友人遗体旁,不肯离去,随后将吴指南暂时安葬在湖侧。几年后重游旧地,含泪持刀,亲自洗刮遗骨,包裹后徒步背负前行,最终借贷筹资,将友人安葬在鄂城之东。读到此处你会想:难怪他朋友遍天下,他对陌生人都肯以命相托。可这个世界待他并不温柔。在扬州,不逾一年,散金三十余万,落魄公子悉皆济之。病倒之后,朋友们作鸟兽散,无一人照看,是客栈老板请来郎中救了他。读到这里,那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就有了新的重量,一个尝过屈辱的人,终于有资格说“不”。

诗酒之于唐人,是失意者的铠甲,也是骄傲者的旗帜。

人间这场离别

韦应物本是长安城里最跋扈的纨绔子弟,自己写诗招供:“身作里中横,家藏亡命儿。朝持樗蒲局,暮窃东邻姬。”除了不做好事,其余什么都做。十九岁那年,他遇见十六岁的元苹,一见倾心,决定弃武从文,进太学苦读,次年成婚。一个浪子,因为一个人,愿意改掉一生的毛病。这本身就像一首诗。可是天妒良缘。元苹三十六岁病逝于官舍,韦应物家中贫约,又没有自有宅第,只能在太平坊租借房屋举行葬礼。他亲手为妻子写墓志:“每望昏入门,寒席无主,手泽衣膩,尚识平生,香奁粉囊,犹置故处。”字字含情,句句忍泪。此后他写《伤逝》,写《送终》,写《感梦》,十多首悼亡诗,每一首都是同一场没做完的梦。后来他做滁州刺史,卸任时想归隐,写下“我有一瓢酒,可以慰风尘”。这句话如今在网上流传甚广,可很少有人知道,那瓢酒里泡着的,是一个失去半生的人。

韦应物的结局,书中写得极冷:他病逝后,幼女流落潭州,沦为舞女。侍御史殷尧藩在酒宴上见到她,写下“姑苏太守青娥女,流落长沙舞柘枝。坐满绣衣皆不识,可怜红脸泪双垂”。读到此处,再回头看他那句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,你会忽然明白:那横在野渡的孤舟,不是意境,是他的一生。

元稹的离别,更复杂一些。书中直言不讳,说他娶韦丛多半是政治投资,攀上京兆尹韦夏卿这棵大树,“至少少奋斗十年”。可七年相处,五个儿子接连夭折,韦丛病逝时,元稹写下《遣悲怀三首》,请人在墓前代读,闻者无不落泪:“昔日戏言身后意,今朝皆到眼前来……诚知此恨人人有,贫贱夫妻百事哀。”感情这笔账,连当事人自己都算不清:是算计还是真心?

还有温庭筠。相传他有一次被主考官特别安排在帘前单独作答,仍在科场中“口授”帮助了八个人,因此得了科场“枪手”的名声;他替令狐绹代写《菩萨蛮》,转头又四处张扬,得罪权贵;他在国子监主持秋试,因替落榜考生鸣不平,把考中进士者的诗文全部张贴公示,得罪宰相,再遭贬谪。他活得荒唐,也活得真实,“这个世界上,本来就有一半人在嘲笑另一半人,张扬一点又何妨”。他一生郁郁不得志,却把情诗写到极致:“玲珑骰子安红豆,入骨相思知不知。”骰子里的红豆,像入骨的相思,藏得再深,也藏不住。这个世界,最终辜负了这些多情的人。

归途那盏灯火

韩愈三岁父母双亡,由兄嫂抚养;九岁,兄长又病逝,跟着寡嫂郑氏颠沛流离。十九岁求取功名,侄子十二郎含泪相送——家资只够一个人去考试,他对十二郎保证:一定考中进士,报答嫂嫂。结果进士考了四次,制科又考了三次,才终于得偿所愿。其间六嫂病逝,十二郎也病逝了。他写下《祭十二郎文》,被后人评为“读《祭十二郎文》不哭者,其人不友”。一篇写进人生最深亏欠的祭文,读来怎会不哭?

元和十四年(819年),宪宗迎佛骨入宫,长安大兴佛潮,有人烧灼头顶、自折手臂祈福,百姓荒废本业。韩愈上表谏言烧毁佛骨,宪宗大怒,欲斩立决,幸得裴度、崔群力保,才被贬潮州。两年后,镇州兵变,王廷凑杀节度使自立,满朝无人敢去宣旨,韩愈站出来:“这是臣下的本分!”他信步穿过剑拔弩张的战阵,面对团团围住他的将士,厉声质问王廷凑,三寸不烂之舌,竟说服叛军撤兵,解了深州之围。回来后,神策军将士私下都说:韩愈连佛骨都敢烧,千万别做违法之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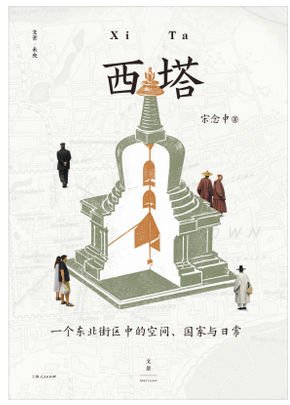
在潮州,他又留下许多轶事:洪水泛滥,他命随从跟着坐骑走,插竹竿标堤线,百姓依线筑堤,从此此地再无水患,这就是“过马牵山”;江边鳄鱼伤人,他设坛祭鳄,限定三日离去。这些传说自然有美化的成分,书中也坦承这一点。但百姓愿意这样美化他,恰恰因为他做过值得被美化的事:开办学堂,教化民风,为一方水土撑起一片天。韩愈的晚年,有一首小诗流传最广: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这是写给老友张籍的,劝他出来踏青。这个一生起起落落、吃尽苦头的人,在人生暮年,看到的不是风霜,而是早春草色里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绿。

长安,不只是一座城。它是功名,是诗酒,是归途,是每个唐人穷尽一生想要抵达、又终将离开的地方。我们每个人心里,都有一座自己的长安。

小柔荐书

一座塔的四百年

王晨辉



《西塔: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、国家与日常》,宋念申著,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。

《西塔: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、国家与日常》,塔在沈阳,书写的是中国,乃至整个东亚。

书里写的是沈阳和平区一个1.24平方公里的小街区。主街七百米,10分钟走完;2019年12月,西塔街道被撤销,辖区并入北市场街道,作者的朋友们却没人注意到这个变动。可就是这么一个“不怎么重要的地方”,从1644年一路走到今天,装下了皇帝、僧人、铁路、移民、工人、韩商和骑手。

这本书换了个看历史的法子:不从上面看,从街道和居民的脚下看。近四百年的沧桑,落在一座塔、一条街、几户人家的日子里,它让世界史在1.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显了形。

故事要从1644年7月31日讲起。盛京城西郊的旷野上,一座白色藏式佛塔开光。

那是个普普通通的盛夏日。满洲贵族们穿着最庄重的朝服,行三跪三叩之礼。礼品按“三九”之数备下,皇家设桌二十、酒十坛,另供馅饼三百,户部宰牛一只、羊二十六只。所有人,包括工匠和役夫都一起吃喝,气氛十分欢畅。

只是这场热闹,没能维持三个月。塔开光那阵子,北京城已经易主。李自成破了京城,崇祯自缢,吴三桂开关,多尔衮入关,六岁的顺治皇帝在这一年十月被迎进北京。盛京不再是首都,成了陪都,一当就是两百多年。

塔是皇太极下令建的,塔还没立稳,王朝的心已经搬走了。所以,这本书从第一页起就在讲一个帝国怎么选址、怎么立威,又怎么把心搬走,而不是在讲建筑。

塔是帝国的一步棋

皇太极建塔,不是为了好看。

1634年底(天聪八年十二月),蒙古察哈尔部来了一位叫墨尔根的僧人,带来一尊金像。传说这是元朝国师八思巴当年为忽必烈打造的护法神像,末代大汗林丹汗曾供奉它,以此彰显自己是忽必烈的继承人。林丹汗败亡,金像到了皇太极手里。这里头的政治含义,明眼人都懂:佛已经选中了新的蒙古之主。

1635年,皇太极改族名“女真”为“满洲”。1636年,蒙古四十九位贵族王公齐聚盛京,献上“博格达彻辰汗”的尊号。同年,皇太极称帝,改国号为“大清”。从此他既是满人的汗、汉人的皇帝,又是蒙古人的大汗。那套从八思巴与忽必烈传下来的互抬身价的旧例,被他用得滚瓜烂熟:僧人们尊他为王,他也替佛门撑腰。满、蒙、藏,一条绳子拴在塔上。

塔是谁设计的,碑上刻了什么字,寺里的僧众吃谁的饭、向谁负责?答案在书中慢慢浮出来。清朝皇帝对佛教的崇奉,比我们以为的更要紧、更实际,也更有算计。皇太极一边供养着僧众,一边又对喇嘛教的弊端保持警惕,此前,努尔哈赤已批评蒙古诸贝子“自弃蒙古之语,名号,俱学喇嘛,卒致国运衰微”。信仰是真的,算盘也是真的。

铁路把世界送进这条街

塔立起来两百多年,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僧人。清亡了,盛京的寺庙没了供养。真正改变西塔命运的,是铁路。

1900年前后,沙俄把中东铁路修到沈阳,第一个火车站就设在西塔附近。日俄战争后日本人接盘,建起满铁附属地,仿照欧洲城市规划新城区。张作霖不服,把京奉铁路的沈阳站也设在离西塔不远的地方,跟日本人打擂台。两条互相竞争的铁路,在离塔大约七百米的地方交会。1928年6月4日,张作霖就是在这个交会点被炸死的。历史的大事件,常常就落在这么近的地方。

铁路也把朝鲜人运了进来。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,大批朝鲜人被推离家园,流散到中国东北。西塔渐渐成了他们的聚落,在颓败的佛塔对面,他们建起一座高大漂亮的基督教堂。

日本人统治时期,为了给殖民统治造势,把奉天古塔印上明信片、写进导游手册,学者、作家、艺术家一趟趟地来,鼓吹帝国的“泛亚”宏图。可光鲜的旅游叙事底下,是西塔街区的另一面:那里的住户多是贫困的工人、小商贩,也有许多在困顿里挣扎的人。同一个地方,在明信片上是一座辉煌的古塔,在生活里是另一副模样。

作者在这里亮出了他对“现代性”的态度:铁路、车站、欧式的街区,这些漂亮的新事物,并不等于线性的进步,它可能是殖民的掠夺,可能是暴力的破坏。同一列火车,两种文明的面孔,作者让它们面对面站着。

留下的人把日子过成了历史

1945年到1950年代,每个离散的朝鲜人都要面对一个选择:留下,还是回国。回哪儿呢?北纬三十八度线,一条美军参谋随手画出的分割线,把半岛分成南北两半。书里有个叫宋姬淑的老人记得,伪村长整天拿着大棒子,戳各家地窖,看底下藏没藏辣白菜。“我们种了一年地,连大米饭都不能吃,吃就犯法。”日本人到村里征兵,叔叔被征走了,女孩也被征,村里好些人家的姑娘十五六岁就赶紧嫁人,免得被抓。“我亲眼看到,被征的家人哭啊。”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。

国家给了西塔朝鲜族学校、医院、商店、文化馆,还有一份特别的照顾,就是每月几斤米。这几斤米,在困难年代是救命的。1959到1961年,宋姬淑记得一个人每月半斤肉、二两豆油,买菜要排队,还买不上。而朝鲜族每月能到粮站领几斤米,掺着别的吃,几乎没挨过饿。

老人们说起这些,不约而同用了一个词:照顾。作者宋念申说,这是访谈中很少出现的、他们主动强调自己朝鲜族身份的时刻。几斤米今天看微不足道,在当时,它让一个少数民族群众感到,自己被国家放在眼里。

日子终究是苦的。西塔的房屋大多是砖木平房,厕所公用,冬天烧煤。整块煤贵,家家买煤末,掺上沙子水,打成方块,再借吹风机吹干,叫“打煤坯子”。车仁锡提起这个就头疼:“现在一想脑袋还疼,礼拜天自己买沙子打煤坯子,烧火可慢了。”塔身被煤灰熏了许多年,“上面都酥掉了”。

宋姬淑每天五点起床,给全家做好午饭,抱着孩子挤有轨电车去厂里。上班带窝窝头当午饭,“好几次下车发现窝窝头都没了,被偷了”。下雨天积水没小腿,她把孩子裹进雨衣,蹚水去上班。晚上回来做饭,七八点吃完,再备第二天的饭,十点睡,第二天五点起。她说:“生活要看你怎么安排,没有过不去的事。”又说:“人赶上什么时代就得适应。反正就是这么过来了。”

那个时代的物价,大酱每斤八角,二十多年没动过;豆腐每斤二分;本地产的“大生产”烟,长期三毛一盒。朝鲜族商店是全沈阳唯一以少数民族命名的商店,汉族人也爱去。本地人总以为西塔的朝鲜族占一半以上,可196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,一万六千多居民里,朝鲜族只占四分之一。这些是历史书里不会写的事。宋念申把它们一段段记下来,不煽情,不拔高。读的人自己会疼。

1990年代,沈阳成了“铁锈之城”,跟铁西区只隔一条铁路的西塔,却在这时候繁盛起来。韩国资本涌进来,朝鲜族餐馆、酒吧、夜总会、洗浴城一家接一家,西塔被叫作“小首尔”。

作者2019年夏天去巡行,延寿寺里一两位僧人当值,再没有别的访客,“显得十分寂寥落寞”。而几百米外的西塔教堂,礼拜堂坐得满满当当,走廊里也坐满了人,乐队唱的是流行歌曲,气氛像现场音乐会。一个寂寥,一个喧腾,隔一条街,各自热闹。

韩流的退潮跟涨潮一样快。2008年金融海啸,韩元大贬,西塔的韩国小企业一家家关门。市府大路上,一座计划中的“首尔广场”成了烂尾楼,十年没有动静。

韩资退潮后,国家在西塔社区治理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。西塔被塑造成民族团结的模范社区,2009年安图社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,2024年又评上一次。在蓝天下,一幢高楼旁巨幅红色标语写着: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,共同繁荣发展”。

塔是复建的,模范是真的。或者说,都是真的。每一代人,都按自己的需要,重新解释这个地方。

地图上消失的地方

作者是清华大学的历史学者,这本书的资料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“多语种、多形态”的:满文、蒙文、藏文、汉文的档案,藏文与日文的文献,加上一次次田野访谈。一块碑、一尊金像、一份街道的房产档案,都能被他讲出一段来龙去脉。

写这么小一个地方,是不是小题大做?宋念申的回答很干脆:微观史是一种观察方法。14世纪法国南部的一个村社,16世纪意大利村庄里一个自学成才的磨坊主,都曾丰富我们对欧洲的理解,那么东北一个街角,凭什么不能丰富我们对中国、对亚洲的认知。

清史学者都谈清朝崇奉佛教,少有人追问朝廷与佛门这套互相倚重的关系最初怎么搭建、怎么管理,他拿盛京的敕建寺庙来回答;谈东北的转型,他接的是地缘政治、殖民现代性、移民与国家建设。他的立场也鲜明:反对把国家与社会看成一对死对头,坚持“在地之人是主要的历史行为者”。

这本书的叙事止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,作者说书写完了,西塔还在变;1998年复建的塔和寂寥的延寿寺,并没有真的接上近四百年前的香火。他没有硬拗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一个地方的历史,本来就不该由一本书来封顶。

作者写,在旅馆里点了个外卖,手机屏幕上跳出一幅地图,卡通骑手向他奔来。“距离您30分钟”“距离您20分钟”“距离您还有5分钟”。地图上依次闪过他白天走过的地标:西塔大冷面、教堂、延寿寺。骑手到了,他道谢,关门,图标消失,地图、地标、地方,一起隐去。屏幕上只剩一行字:订单已完成。

近四百年,从向僧人三跪三叩的贵族,到屏幕上的卡通骑手。塔还是那座塔,虽然是复建的,街还是那条街。可人和地方的联系,正在被时间和算法一点点抹平。作者用这个结尾,几乎不动声色地把微观史讲到了今天。

西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,可就是这么个“不怎么重要的地方”,拖着一条近四百年的历史尾巴,抵达了今天。

它是佛塔,是铁路枢纽,是朝鲜人聚落,是“小首尔”,是模范社区。一层压着一层,像地质剖面,每一层都有一段时代的记忆。地理学者约翰·阿兰说过,任何地方或区域,都是拖着长长的历史尾巴“抵达”当下的。西塔也一样。

《西塔: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、国家与日常》里的皇帝、僧人、军阀、韩商、骑手来来去去,塔一直在。塔不说话。替它说话的,是书中人物宋姬淑的窝窝头,是车仁锡的煤坯子,是金玉奎采十斤才卖一斤的桔梗,是冷面馆里只收现金的固执。历史最终落到地上,就是这些。

你住的街道,多半也拖着一条长长的历史尾巴,只是还没人替它写下来。

四百年其实很快,快得像那个开光的下午,馅饼三百,牛一羊二十六,所有人都吃了喝了,以为日子会一直热闹下去。塔还在,人换了。下一个四百年,不知道谁会站在这条街上,不知道地图上还会不会有一个叫西塔的地方。但总有人记得,这座城市西边,立过一座白色的塔。塔下住过各种各样的人。他们把日子,过成了历史。